

马王堆帛书《要》篇校读

曹菁菁

《要》篇属于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《易》的传文部分。《易》的经文1984年就已经公布^①，但是易传部分除了于豪亮先生作了简要的介绍之外^②，一直在整理中，没有公布。1988年韩仲民先生披露了《要》篇的部分内容^③，而《要》篇较为完整的释文则于1993年由陈松长、廖名春发表^④。此后不久，日本的池田知久也发表了他对《要》篇的释文^⑤，此后，廖名春又先后发表了《帛书释〈要〉》和《帛书〈要〉释文》^⑥，对释文作了一些修正。池田知久也发表了《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〈要〉篇的思想》对释文作了一些修正^⑦。

张政烺先生是当年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的负责人之一，他对《易传》有一份考释研究的文稿，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发表。张先生故后，该文稿终于公布于众^⑧。本文主要将张先生的《要》释文、廖名春的《帛书〈要〉释文》以及池田知久的《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〈要〉篇的思想》的释文进行比较，考证异文，并就《要》的思想特点谈谈自己的看法。

①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：《马王堆〈六十四卦〉释文》，《文物》1984年第3期。

②于豪亮：《帛书〈周易〉》，《文物》1984年第3期。

③韩仲民：《帛书〈系辞〉浅说》，《孔子研究》1988年第4期。

④陈松长、廖名春：《帛书〈要〉简说》，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3辑，1993年。

⑤池田知久：《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〈要〉篇研究》，《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》第123册，1994年。

⑥廖名春：《帛书释〈要〉》，《中国文化》第十期，1994年。廖名春：《帛书〈要〉释文》，《国际易学研究》第一辑，华夏出版社，1995年。

⑦池田知久：《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〈要〉篇的思想》，《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》第126册，1995年。

⑧张政烺：《马王堆帛书〈周易〉经传校读》，中华书局，2008年。此书影印了张先生全部书稿并收录了张先生当年所用的帛书《周易》照片。又，张政烺著、李零等整理《张政烺论易丛稿》（中华书局，2010年）下编为张先生手稿的整理稿，并加有案语，便于利用。

一、异文校勘

张先生、廖名春和池田知久三位学者的释文主体部分大致相当，只有少数地方存在差别。下面简要说明一下三篇释文中异文的情况。

第一行

张：……焉。察天之道，天之□德□□也。地……

廖：………肴有……

池田：………德之□也。地……

案：虽然对于第一行的释文有异，但三位学者都认为第一、二两行的内容大致相当于今本《系辞下》“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”一章^①。帛书照片《易之义》末行后缀有两个残片，上面的字迹可辨认的有“察天之道天之□”和“德□□也地”。显然，张先生把这两片缀连拼在了第一行，而池田只把第二片残片拼在了第一行。这两片残片在廖名春1995年公布的《易之义》释文里并没有出现^②。根据今本《系辞下》相似内容的辞例，张先生的拼接结果更科学。

第六行至第七行

张：6.………□命者也。易……德则……

……

7.明，而甚不………行其义，长其虑，修其……君子安□………易矣。若夫祝巫

廖：6.………至命者也。易……

……

7.明而甚………行其义，长其虑，修其………易矣。若夫祝巫

池田：6.………至命者也。易……德则……

……

7.明而甚不………行其义，长其虑，修其………易矣。若夫祝巫

案：“命”字前面一字，从照片上看只存有一半的字迹，是否释为“至”还可以再讨论。张先生的释文比廖、池田两位的释文每行分别多出了“德则”、“君子安□”若干个字。查检帛书照片，在六、七行上正有一个小残片右行为“□德则”，左行是“君子安□”（安下一字，存上半部分，与“不”字上半部分一致）。同时，照片在第八行“不能知易”和第九行“忘危存不忘亡”上面拼接

①廖名春：《帛书释〈要〉》，《中国文化》第10期，1994年。池田知久：《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〈要〉篇研究》，《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》，第123册，1994年。

②廖名春：《帛书〈易之义〉释文》，《国际易学研究》第一辑，华夏出版社，1995年。

了一小残片，其上右行为“此□”，左行有“亡□”两字，不能确释，然字形与“君子安不”无涉。但张先生的释文并没有采纳这种拼接方式，而是在第八行“不能知易”前补上了“无德则”，在第九行“忘危存不忘亡”上补上了“君子安不”。由此可见，张先生似乎在此处补上了一个与第六、七行上的残片一样的残片。然而我们查检了照片，并没有发现两片这样的残片。张先生很可能把此残片使用了两次。由于八、九行的内容见于今本《系辞下》，我们最好把这个残片补在第八、九行上。综上所述，廖、池田两位对六、七行的释文比较可取。

第十一行

张：天地困，万物润。

廖：天地盈，万物润。

池田：天地困，万物润。

案：照片上此字作“匱”，显然为“困”而非“盈”。廖氏的释文不妥。张先生认为，这句话出自今本《系辞下》的“天地𬘡缊”，帛书“困”是“因”字之误，而且脱了“缊”字。这个解释比较合理，也符合文字规律。

第十三行

张：前𦥑而至者，弗𦥑而巧也。

廖：前羊而至者，弗羊而巧也。

池田：前羊而至者，弗羊而巧也。

案：张先生释“𦥑”的字在照片上写作“𦥑”，廖、池田都隶定此字为“羊”，廖训为“祥”^①。“羊”在马王堆竹帛中一般写作“𦥑”或者“𦥑”，只有一例写作“𦥑”，见于《十大经》，原文是“𦥑於鬼神”。但从文义上讲，此处也可读为“逆”^②。帛书中，“羊”和“𦥑”作偏旁时都可以写作“𦥑”，如，“祥”写作“𦥑祥”，“逆”写作“𦥑逆”。而且“逆”也写作从“羊”的字形，如“𦥑”、“𦥑”。所以释读“𦥑”、“羊”时，会出现混同的情况。但从帛书的情况来看，作为单字的“𦥑”、“羊”，应当还是分别的，“𦥑”当释为“𦥑”较好。

第十四行

张：察其要者，不趋其辞。

廖：察其要者，不趋其福。

池田：察其要者，不趋其杂。

案：张先生释为“辞”的字有残，写作“𦥑”。马王堆简帛中，“辞”写作“𦥑”，“福”写作“𦥑”，“杂”写作“𦥑”。只有“辞”的写法与这个残字相

①廖名春：《帛书释〈要〉》，《中国文化》第10期，1994年。

②陈松长：《马王堆简帛文字编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01年。

符，故当释为“辞”。

第十四行

张：尤于

廖：必于

池田：必于

案：张先生释为“尤”的字原文作“”，正是尤字。马王堆简帛中，“必”写作“

第十五行

张：柔者使知图。

廖：柔者使知刚。

池田：柔者使知图。

案：张、池田释为“图”的字原文作“

第十六行

张：吾百占而才当。

廖：吾百占而七十当。

池田：吾百占而干当。

案：张先生释为“才”的字原文作“

第十八行

张：向之而来也

廖：向之而未也

池田：向之而未也

案：马王堆帛书中，“未”作“

第二十二行

张：故要之以上下。

廖：故为之以上下。

池田：故要之以上下。

案：张、池田释“要”对，廖释“为”误。

第二十三行

张：五正（政）之事不足以产之。

廖：五正（政）之事不足以至之。

池田：五正（政）之事不足以堇之。

案：张先生释为“产”的字原文残，作“**𠂔**”。马王堆简帛中，“堇”作“**𠂔**”，“至”作“**𠂔**”，“产”作“**𠂔**”。原文与“产”的字形最为吻合，宜释为“产”。

二、篇义探读

《要》是一篇独立成篇、有篇题有分章的传。在其分章上，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。由于后面的两章，分章符号十分清楚，所以分歧都在第一行到第十二行的分章上。池田知久把这一段分成了6章，而李学勤先生把这一段至少分作两部分。其实，《要》篇的开头残缺很厉害，我们不妨把《要》分为三大部分，第一部分，从开头至12行“此之谓也”，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见于今本《系辞下》；第二部分，从“夫子老而好易”至18行“祝巫卜筮其后乎”；第三部分，从“孔子籀易”至文末^①。其内容大致如下：

第一章

第一行至第三行，其内容相当于《系辞下》第十章。主要在论述“易之道”，在作文之人看来，吉凶之变的根本是天地之道，天地之道的标准在于“德”。

第三行至第八行，残缺严重，其内容不见于今本《系辞下》，也不见于其他古籍。第7行有“行其义，长其虑，修其……”的文辞，与《荀子·王霸》中“汤武非取天下也，修其道，行其义，兴天下之同利，除天下之同害，而天下归之也”文辞相近。帛书中的这几句话应该也是在强调“道”、“义”的决定性意义。

第九行至第十二行，除去多有假借字以及个别异文之外，所记内容与《系辞下》第五章后半部分一致。

由此可见，今本《系辞》的部分内容最晚在汉初就已经有成型的素材了。

第二章

这部分内容不见于传世文献，最为重要。其内容主要是子贡与孔子的问答，主题在于孔子对自己老而好《易》的解释。孔子老而好《易》并为《易》作传的说法自汉以来颇为流行，然自疑古思潮兴起以来，这个说法遭多方质疑。很多学者都认为，孔子与易传无关。而记载孔子直接评论《易》的《要》篇之发现，又一次引发了学者的争论。

^①关于《要》篇的全文释文，可参考张政烺著、李零等整理：《张政烺论易丛稿》，中华书局，2010年，第239—251页。

这段内容从辞气上讲，与《论语》基本一致。我们认为这一段文字的来源应当较早，很可能是孔门弟子的追记。《论语·述而》记录孔子之语云：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”司马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也云：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序彖、系、象、说卦、文言。读《易》，韦编三绝。曰：‘假我数年，若是，我于《易》则彬彬矣’。”可见，孔子确实对《易》产生过极大的兴趣。

《要》篇的第二部分，对孔子“晚而好易”有了更详细的描述，反映了孔子对《易》的态度。对孔子老年时候的“好易”，子贡提出质疑：老师您以前教导我们说“德行亡者，神灵之趋，智谋远者，卜筮之繁”，只有无德无智的人才相信鬼神占卜的那一套，我深以为然，可是现在您老人家怎么喜欢读《易》这种占卜书了呢？孔子对此作出回答，他说，君子言行有规矩，是因为不违背“德”。《尚书》也多有错误的地方，《易》也有说的对的地方；而且《易》还有很多古代的言辞。我好《易》并不是肯定它的占卜用法。子贡反诘道：您以前说过，君子应当“逊正而行义”，做事要名正言顺，现在您喜爱《易》的文辞，却不认同它的用处，这样算是君子的作为吗？孔子于是从自己对易、卜筮、道、德等方面的认识进行了辩白。首先，孔子强调了《易》的社会功用，它可以“刚者使之惧，柔者使之刚，愚人为而不妄，慎人为而去诈”，在孔子看来，《易》颇有“中庸”之德。然后，孔子又指出了《易》的文献价值。孔子认为《易》与文王有关，研习《易》可以知道孔子自己的偶像——文王——事商纣的情况和心理。至于卜筮本身，孔子强调了自己不相信的态度。孔子认为，卜筮只不过是“从其多者而已”的一种概率游戏，对于孔子来说，他是“后其卜祝，观其德义”。他提出了《易》的三个层次：贊、数、德；即分别指卦爻辞、卦象及其数理（含天文历法）、形而上的哲学含义。只知道附会卦爻辞而不懂卦象及数理的人，只能算是装神弄鬼的巫；只了解卦象而不懂得它所包涵、映射的形而上哲学意义的，只能算作史。史巫的卜筮“向之而未也，好之而非也”，不懂得《易》的宗旨与哲学内涵，根本不算真正地了解《易》。孔子说，自己是“求其德”，研究的是《易》反映的哲学思想，而不是卜筮本身。于是孔子最后评价自己道：“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。”

从孔子的辩白来看，他仍然坚持了自己本来“不语怪力乱神”的思想，即对鬼神敬而远之，且不相信卜筮之类的事。但是，对于古代的典籍，他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，即使是当时被当作占卜之书的《易》，孔子也能看到它的文献价值，并从中研究古代的哲学思想。这与《论语》所体现的孔子形象也是相合的。

第三章

这部分记载的内容以孔子读《损》、《益》二卦有感为引子，强调了《易》的价值在于它包含着天地变化的普适哲理。其实《淮南子·人间训》、《说苑·敬慎》都有孔子叹《损》、《益》二卦的记载。其中《淮南子》的记载比较简单：

孔子读《易》至《损》、《益》，未尝不慨然而叹，曰：“益损者，其王者之事与！”事或欲以利之，适足以害之，或欲害之，乃反以利之。利害之反，祸福之门户，不可不察也。

主要强调了福祸相依，利害相返，主观意愿与现实结果多有反差的哲学观点。

《说苑·敬慎》的记载，则是以孔子与子夏之间的对话展开的：

孔子读《易》，至于《损》《益》则喟然而叹。子夏避席而问曰：夫子何为叹？孔子曰：夫自损者益，自益者缺，吾是以叹也。子夏曰：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？孔子曰：否。天之道成者未尝得久也。夫学者以虚受之，故曰得。苟不知持满则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。昔尧履天子之位，犹允恭以持之，虚静以待下，故百载以逾盛，迄今而益彰。昆吾自满而满意，穷高而不衰，故当时而亏败，迄今而逾恶。是非损益之征与？吾故曰：谦也者，致恭以存其位者也。夫丰明而动，故能大。苟大则亏矣。吾戒之。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。日中则昃，月盈则食。天地盈虚，与时消息，是以圣人不敢当盛。升舆而遇三人则下，二人则轼，调其盈虚，故能长久也。子夏曰：善。请终身诵之。

这段文字虽然文句较长，但是文章主旨与《淮南子》的记载相近，只不过把损、益的矛盾转化关系阐发为盈亏之间或虚满之间的矛盾转化。其中对于“虚静”思想的强调和对“示弱”的推崇，显然是受到老庄思想的浸染，这一文本应当有后人特别是黄老学说之人的改造。

帛书这部分的内容，也记录了孔子感叹《损》、《益》二卦所体现出的矛盾转化之道。但与《说苑》不同的是，其所阐发的方向并非“虚静”、“示弱”，而是用“损”、“益”两卦对应节气物候的变化来说明盈亏的转化。其基本阐述如下：

“益”卦所代表的时间是春夏之交的时候，正是万物繁盛生长的时候；而“损”卦则代表了秋冬之交的时候，万物凋零，寒冬将至。然而，“益”卦的卦象，是始吉而终凶，“损”卦的卦象则是始凶而终吉。因为节气之相连注定“益”的繁荣之后将会一片凋零，而“损”的肃杀之后也能迎来万物复苏。“损”、“益”之间相互对立转化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哲理，“足以观天地之变”作出了最后总结：明白了损益相承的人，就不会被外界一时的忧喜所影响。不必去占卜，也知道世事的吉凶变化，这种状态才是“易道”。

显然，《要》篇此处对于“损”、“益”的论述，是为了用实例说明《易》中含有普适的哲理。它的目的在于强调：虽然《易》用“阴阳”、“柔刚”、“八卦”等抽象的术语、概念以及卦象来推演吉凶，但是，这些表象背后所包含的哲理却是带有普适性质的，值得学习和研究。

《要》与今本《系辞》的紧密联系，及其对于孔子的记载，引发了学术界对于《要》篇源流的讨论。王葆玹、陈鼓应认为帛书本《易传》是比较早的本子，而今本形成较晚。今本《系辞》的这些内容是后人把《易之义》、《要》打散之后塞进原本《系辞》的痕迹^①。

^①王葆玹：《从马王堆帛书看〈系辞〉与老子学派的关系》，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1辑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。陈鼓应：《马王堆出土帛书〈系辞〉为现存最早的道家传本》，《哲学研究》1993年第2期。

另外一些学者则不同意这个观点,他们认为,帛书本易传并不比今本易传更早,实际上,帛书本是在今本的材料基础上编成的。廖名春认为,《要》篇并不是一篇专题论文,而是一种资料汇编,一种重要易学文献的摘录^①。李学勤则提出了另外一种假设:由于秦火,楚地的《系辞》散乱了,当时的人整理未能恢复原状,把散简若干章节和其他若干材料编到一起,成了《易之义》和《要》篇^②。廖、李二位学者的推测显然引发了另一个问题,即《要》篇的编纂到底是刻意为了表达某种思想而重新编排的,还是无意地资料的汇集。

我们认为,在讨论《要》篇形成的问题之前,需要明确它与今本《系辞》的区别。虽然两者都属于汉代阐释《周易》的系统,但是仍有文本源流的不同。仅仅因为帛书本比较早,就把它作为今本《系辞》的祖本,是缺乏足够证据的。

帛书《要》是汉代早期黄老学说盛行之时,在长沙国地区出现的《易》的一种注释本,这个本子无疑有较早的来源。而且《要》篇中这三章内容的排列绝对不是没有逻辑关系的,第一章总述德、道重于卜筮,又从几条爻辞出发阐述了君子之为道;第二章,用孔子和子贡的对话,阐明了卜筮本身并不是被关注的重点,重点是“达乎德”;第三章则以孔子叹《损》、《益》二卦为例,指出《易》囊括了天地人道的变化,明白了《易》之道,便可“得一而群毕”。显然,第二章和第三章是对第一章观点的阐述。三个章节从一般到特殊,从总论到分论,绝对不是无意义的摘要拼接。编纂者又把这部分题名为《要》,强调儒家学《易》,是学《易》之德与道,即哲学思想,而不是学习卜筮的功夫,这正说明了儒家传《易》的根本原则,篇题与内容相得益彰。因此我们认为,《要》的形成恐怕不是由于资料散乱而作的无奈的汇编,而是对学《易》的宗旨和方向进行了说明。

除了“大衍之数”一章之外,今本《系辞》的全部内容都分布在帛书《系辞》、《易之义》和《要》中,文辞相当,其材料不像有严重的散乱。而帛书的易经部分,六十四卦的排列与今本不同,自有其一套编排方式。因此,帛书本的《易传》很可能像帛书本《易经》一样,与今本有相同的材料来源,但是出于表达不同易学流派的思想的需要,采用了另一种编排方式。而《要》篇在当时的这种编排当中,显然是作为儒家某学派传《易》的一个关键思想而得以成篇的。

我们今天再做研究,应当跳出今本《易传》的限制,把《要》篇,甚至整个帛书《周易》都做一个独立的版本来看待,关注它的学术史、思想史价值,不要在文本上与今本强做版本源流的联系。

作者单位:北京大学中文系、国家图书馆

①廖名春:《论帛书〈系辞〉与今本〈系辞〉的关系》,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3辑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3年。

②李学勤:《帛书〈周易〉的几点研究》,《文物》,1994年第1期。